

杜车别◎著

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再探讨

中国古代皇朝周期性盛衰灭亡实质并非停滞轮回，
恰恰是社会发高度活跃的标忘。

中国历史停滞吗？



世界知识出版社

中国历史停滞吗？

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再探讨

杜车别◎著



世界·中国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历史停滞吗? : 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再探讨 /

杜车别著. — 北京 :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9. 6

ISBN 978-7-5012-5970-0

I. ①中… II. ①杜… III. ①中国经济史—研究—古代 IV. ①F12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42950 号

中国历史停滞吗? : 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再探讨

Zhōngguó Lìshǐ Tíngzhì Ma ? : Duì Zìběnzhǔyì Méngyá Wèntí Zài Tàntǎo

作 者 杜车别 封面摄影 赵殿云

责任编辑 薛 乾

责任出版 王勇刚 装帧设计 周周设计局

内文制作 宁春江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100010)

网 址 www.aol934.org www.ishizhi.cn

联系电话 010-58408356 010-5840835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印张 710×1000 毫米 1/16 30.5 印张

字 数 402 千字

版次印次 2019 年 6 月第一版 2019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5970-0

定 价 52.00 元

(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出版社调换。联系电话: 010-58408356)

历史进步是多因素、各环节互相配合，连锁互动之结果。一定阶段，影响思想交流深广程度的科技因素起关键作用。特定技术条件未成熟时，商业发展不足以推动社会实现飞跃性突破，相反，上升到一定阶段就会产生破坏性作用，导致社会崩溃重组。而当技术条件成熟时，先进社会更易于通过累积实现进步的因素，却可能与其他因素不同步而造成脱节，使社会陷入更脆弱，更易于被外敌侵略破坏的状态。由此，更先进更活跃的社会，却隐伏着陷入落后之危机；进步所受阻力更小，却更易夭折于野蛮外力之打断。但不能因此把先进视为落后，把进步视为反动。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如果说《大明王朝是被谁干掉的》一书横向截取明亡的历史关键节点，剖析展现此理，那么《中国历史停滞吗？》则是纵向梳理，揭示先进与落后，强大与衰弱，互相转化催生，起伏波动背后的深层原因。

作者对中国长期重农抑商、缺乏资本主义精神、儒家思想阻碍发展、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等流传甚广的偏见，做了有理有据的分析驳斥。定义并区分了星火意识和燎原意识的概念。在此基础上指出判别资本主义萌芽的核心标准在于是否存在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催生的星火意识上升为燎原意识的过程，由此解决围绕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理论困惑。

分析历史发展，难免中西对比。作者通过具体理论和事实分析，厘清两个社会发展的共通性和不同性，指出西方历史发展和中国历史真正合理的对应，破除那种认为中国古代皇朝更替不过是停滞轮回的观念。

杜车别

1978年生。上海嘉定人。真名孙海宁。毕业于上海大学数学系，获硕士学位。

已出版著作：

《明·冤——毛文龙、袁崇焕与明末中国历史的走向》（2013年，三联书店）。

《大明王朝是被谁干掉的》（明朝灭亡的原因与中国古代政治的超前发展）（2017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入选2017年军事历史联合书单。

《明末清初人口减少之谜》（2018年，中国发展出版社）。

《元亨论：祛除中国人的思想自卑》（对中国传统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正本清源的分析梳理和再认识，由中央党校刘余莉教授作序）（2018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入选2018年度荐书，儒家网2018年大众类十大好书。

《中国历史停滞吗？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再探讨》（2019年，世界知识出版社），由中国人民大学毛佩琦教授作序。

另著有《民族理论综述与明清评价问题》《生产积极性变革理论》等。

《中国历史停滞吗？》写于2006-2007年，在网络上发布时名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再探讨和对中国历史的重新认识”（“明朝灭亡的原因和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超前发展”是书稿的第二编，后因篇幅关系独立成书，出版时改为《大明王朝是被谁干掉的》）。此次出版，做了一些修改补充，并由毛佩琦教授作长序导读。相信作者广大深邃的思想内核和理性严谨的思维方法会给求真求证的读者带来有益的启发。

淘宝店铺和微店：世知东方书店

直销电话：（010）58408356 13264498205

序一 解开心结，回到历史

毛佩琦

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有悠久而丰富的历史记载。中国人多有历史癖，上下皆然。梁启超先生曾经发出浩叹：“中国古代，史外无学，举凡人类智识之记录，无不丛纳之于史。”¹

中国又有“史鉴”的传统，史之为用，可以知兴替。然而，也如梁先生所说：“我国人治何种学问，皆含有主观的作用——掺有他项目的，而绝不愿为纯客观的研究。……为史亦然：从不肯为历史而治历史，而必侈悬一更高更美之目的——如‘明道’、‘经世’等，一切史迹，则以供吾目的之刍狗而已。其结果必至强史就我。”²

进入新时代，史家应该有新的追求，不再为“明道”、“经世”所约束，所以梁先生又说：“吾侪今日所渴求者，在得一近于客观性质的历史。……欲为纯客观的史，是否事实上所能办到，吾犹未敢言。虽然，吾侪有志史学者终不可不以此自勉；务持鉴空衡平之态度，极忠实以搜集史料，极忠实以叙述之，使恰如其本来。”³

梁先生这些话是在1921年就说了的。同时代的一些学者如胡适先生也有类似的见解。然而，快一百年过去了，旧史学且不论，新史家的中国历史研究怎么样呢？可以说成就很大，完全开辟了新的局面，但留下的缺憾也不少。

何以言之？近百年中国史研究确实出了不少传世大作，史坛面貌一新。但

1.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三章·史之改造，中华书局，2009年1版，2014年6印：38。

2. 同上：40。

3. 同上：41。

是在经世致用的口号下,把历史当作“供吾目的之刍狗”,“必至强史就我”的情况亦复不少,难以说作成了“恰如其本来”的历史。

历史学,从根本上说是历史认知学加历史解释学,过去将此二者称为考据和义理。我们所说的客观真实,也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历史事实本身的真实,一个是对历史事实的评判和论断的准确。仅仅拼接了历史的碎片,复原了历史的表象,并不能算得到了完整的历史真实。而如果对历史的解读出现了偏差,对历史的评判论断不符合历史的本质,仍然是对历史的扭曲和误塑。犹如画家画像,即使五官准确无差,但精神气质却与人物不符,肯定不是好作品。甚者,画家不顾客观对象,执意按自己的想法有所取舍,更会与真实形象相背离。史家记史、论史亦然。

杜车别的《中国历史停滞吗? :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再探讨》是一部大书,是对一系列关于中国历史成说的质疑,他认真追寻这些成说背后真实的历史,并对其做出全新的论断。许多历史的真相被揭露出来,许多为人深信不疑的成说被颠覆。作者展示了一部不一样的中国历史,在历史研究的方法论上,也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中国古代社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是贯穿本书的大问题。大家都知道,自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出现在中国史坛,至今接近百年,仍然是言人人殊,各执一词。虽然大众通过教科书等渠道接受了所谓资本主义萌芽的概念,但是在史学界对此并没有达成共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究竟是什么问题?是什么在影响了或约束了对于它的研究?前者的答案肯定会大大超出史学领域,后者则是史学家不能回避的责任。

中国历史上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历史问题。

首先,对中国历史上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是探讨中国的社会性质,为中国革命路径提供理论依据。自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走俄国人的路,是一些

知识分子的追求。为什么要走俄国人的路，需要理论上的支持，需要研究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共产主义为终极目的，并从中引申出“五种社会形态说”。这成为一些史学家重新解释中国历史的基本理论。他们论证中国走共产主义道路的必然性，也从而论证“五种社会形态说”在中国历史研究中的适用性。那么，中国古代史上必须有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虽然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社会，至少也要有资本主义社会的萌芽。反之，如果中国历史上没有资本主义社会，甚至萌芽也没有，那么，就会导致中国特殊论和中国发展停滞论。然而，在他们看来，中国是不可以特殊的，也是没有停滞的。当然，此时也有一些学者从学术的角度，用马克思主义做指导重新解读中国历史，但是革命理论家们的研究，其政治意图是十分明确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史学界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并且赋予了新的意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编写的中国历史，成为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学习的必修科目，是政治理论学习的重要内容。在学术上，对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深入广泛地开展，规模空前，但也出现了简单化和公式化的倾向，将中国历史发展与欧洲历史发展的模式简单划一，将中国历史纳入预设的历史框架，在中国历史中寻找具体形象，为其做证据、做注释。历史上外国有的，中国也要有，甚至，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时段也要一致。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以及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等的大讨论，就是在这种氛围中展开的。尽管当时也有学者意识到，如此这般，将会是“三尺郎君七尺妻，凑得头齐脚不齐”。¹ 尽管各家各派在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时间、发展的程度等具体细节上有激烈的争论，但也只是五十步百步之间，其实争论各方都是一派。

史学在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中占据主导地位，在一些重大问题是必须定于

1. 范文澜，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57（2）

一尊的。一些经典作家对中国的历史问题有许多论述,这是不容讨论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涉及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问题。按照教科书的标准叙述,中国近代史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从此中国由封建社会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对于这一论断,长期以来中外学术界一直存在不同意见,一些学者也尝试提出不同的看法。1956年,尚钺先生在《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序言》中写道:“不拘从社会经济的发展上,或是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发展线索上,以及从中国社会内部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继续和发展上,以1840年外国资本主义侵入的时间划一个分界线,都是不很妥当的,而且有着斩断历史发展线索的毛病。”¹这种离经叛道的论述毫无疑问地受到了严厉的批判,被指为“推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中国历史的根本观点……直接牵涉到中国革命斗争的一些重要问题。”²这一论点被称为“反马克思主义的”、“托洛茨基分子的理论”³,“所有这些谬论都是为了淆乱中国历史发展的真正规律,歪曲中国社会的性质,以此反对党的革命路线”⁴。在中国革命胜利后把这种论点说成是反对党的革命路线,令人匪夷所思。一些人把他们的分歧称为历史科学领域的“阶级斗争”,历史研究则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回顾上世纪50到60年代中期的大量史学论辩的文章,可见堆砌满目的标签教条,历史事实却晦而不彰。史学家们研读经典的功夫确实是令人佩服的,在中国,解经注疏式的治学方法是有悠久传统的。

恢复或重建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是研究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的另一个出发点。近百年来,中华民族因落后而遭受的屈辱,令人刻骨铭心,我称之为

1. 尚钺,《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序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2. 刘大年,《关于尚钺同志为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一书所写的序言》,《历史研究》,1958(1)。

3. 黎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私人科学?》,《人民日报》,1960-2-04。

4. 翦伯赞,《“新冒出来”的史学体系还是旧的传统史学体系的翻版?》,《历史研究》,1960(3)。

“悲情心结”。中国历史被视为发展缓慢的，甚至是停滞的。因此，必须驳斥中国历史停滞论，必须强调中国历史是不断进步的，即使没有外国帝国主义进入，也会产生资本主义。只有如此才能祛除中国人的自卑感和任何外国人对中华民族的歧视与偏见。然而，我感到，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更多的是在强势文化面前表现出的惶恐。其深刻的背景是以西方为中心论，是以西方模式为标杆的。于是，一定要在中国历史上找出资本主义萌芽来，以表示中国并不在人类文明之外。仿佛有了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就与世携行、与有荣焉了。然而，历史实际是中国并没有自行产生过完整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即使出现了所谓资本主义的萌芽，也没有能够继续成长壮大。这样，把中国历史纳入预设的西方的历史框架中，既不符合中国的历史实际，也不能从根本上找回民族自信心。难道，中国历史发展就不能走一条与西方不同的道路吗？西方史家批评中国史家对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是要证明中国人自己有能力推动社会的进步”，“背后是中国近代兴起的‘民族主义’”。苏联史家更攻击中共史家采取了“教条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毫不掩饰的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的观点”，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¹无疑，这些批评是偏激的，是带有歧视性的，但因此也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珍视我们民族的独特性，正确评价我们的历史，不向西方看齐，才是民族自信心的表现。

理所当然，在深重的民族危机之下探索强国之路，找出中国落后的原因，史学家应该引以为责任。诚如作者所说：“分清什么是先进，什么是落后，不是只有历史的意义，而更有现实的意义。究竟什么是糟粕，应该丢弃；究竟什么才应该保存发扬，这是一个大问题。”（前言，第1页）但是，历史的诊断必须准确，必须符合中国实际。一些史家坚持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大部分时间都是

1. 引自徐泓：《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范式与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18（1）

重农轻商的”；坚持认为“重农轻商是保守、落后的标志，是中国之所以陷入停滞，并在近代落后于西方的原因”（第34页），等等，其实并不符合中国的历史实际，是找错了方向。对这些几乎是众口一词、几乎成为国人“常识”的观点，本书作者非常智慧地指出：“中国历代宣扬重农抑商的思想从来没有断过，这一事实与其说是证明中国古代重农抑商，倒不如说是展示出中国古代大部分时间商重农轻的社会现实。……大部分的思想家、文人学者所看到的社会现实是重商抑农，商重农轻，商业高度发展，农业相对萎缩，所以他们才一次又一次地提出，要重农抑商，来扭转和改变社会的趋向。”（第15页）作者努力揭示了历史的真实情况，也揭示了史家的主观偏差可能对历史事实造成的遮蔽。作者将其称为“选择性失明”（第19页）。本书所列举的许多偏颇的历史观，都与这种选择性失明有关。

近年来，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退潮了。学术界思想大解放，许多研究禁忌被打破。深入的国际交流，也使研究者的视野更加开阔，研究方法更加多样。一些史学著作不再使用五种社会形态的叙述框架，有学者指出，它并非是马克思本人的理论，而是苏联时期“联共党史”中建立的理论；亚细亚生产方式也是可以讨论的了。一些论著将中国历史自宋代以后所发生的变化，表述为“社会转型”，即从古代社会到近现代社会的转型，这是一种更为中性的表述方法。我认为“转型”还不是一个恰当的词，它涉及什么是近代性，涉及历史段落如何划分，是不是有必要划分为古代和近代的问题。最重要的，它的背后还是有一个以西方历史为标杆的影子。

然而，许多史学家为之竭尽心血，活跃于数十年、声势浩大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也并非完全没有意义，无疑，它大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传播，影响和改变了中国的文化和学术面貌。在学界尝试建立中国历史的新体系时，大量历史典籍得到重新整理，大量的历史材料被发掘出来，长时期不被

重视的社会生活史、物质生活史等研究得到空前发展。如徐泓教授所说：“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的大量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成果，通过搜集方志、笔记、文集、官方档案、实地调查材料以及民间文献、碑刻、契约中的相关史料，从无到有，填补了过去我们对明清社会经济史认知的空白。这对于破除长期盛行的‘中国停滞论’以及‘忽略传统中国社会内变能力、认为只有靠外力才能打破停滞’的‘新帝国主义’理论有极重大的现实意义，也是寻求合理解释前近代明清社会经济的发展迈出的重要一步，在学术史上有极重大的贡献。”（徐泓：前揭文）

本书回顾了中国历史上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辩的历史，指出了其理论缺陷，也肯定了它的积极意义。作者对中国历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都提出了不同以往的看法。他说：“我写的这本书，不指望证明其绝对正确，也不指望说服所有的人。一部分人通过看我这本书，有所启发、有所感悟，能够看到某些东西是自己以前忽略的，某些观点是自己以前没有想到过的，能够让一些人对历史的看法更深刻、更透彻，哪怕是在反对我这本书的基础上的深刻，那么也算是这本书的价值所在了。”（前言，第 3 页）

本书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历史研究的方法论上。他说，“许多人被预定观念禁锢了思维，立场先行”。“他们深信不疑”一些“被灌输的教条”，如“中国自古就是重农抑商、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如何高压专制、中国的儒家思想如何反动如何落后、清朝的统治不过是明朝统治的自然延续、中国民族的劣根性是源自中国文化本身”，等等（前言，第 3-4 页）。“立场谬误不要紧，自然有相反立场的人来辩论、来纠正”。“缺乏自己的独立思考，不去寻找相应的事实和道理来反驳，而把别人不符合自己偏见的立场当成问题”（前言，第 4 页），才是真正的问题。如此棒喝，足以让一些研究者有所醒悟。

还是回到开头，仍用梁启超先生的话：“故吾以为今后作史者，宜于可能的

范围内，裁抑其主观而忠实于客观，以史为目的而不以为手段。夫然后有信史，有信史然后有良史也。”¹“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但是，“必须要先有真事实才能说到意义，有意义才能说到价值，有意义及价值才可说到活动。”²

一言以蔽之，作者通篇都在讲一个道理：历史研究，不能概念先行、教条先行，只能史实先行。所谓不能“以论带史”，而要“论从史出”。不能让历史去适应概念，而应该在扎实、真实的史实基础上去推导结论。同时，对于前人研究的结论必须予以尊重，但也允许大胆地提出怀疑，这是学术进步的需要，也是学术发展的规律。心结必须解开，思想必须解放，禁锢必须打破，让历史回到真实，后人一定会超过前人。陈寅恪先生说，一代有一代之学术，在这个意义上也是适用的。

2018年10月10日

（毛佩琦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明清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常务副会长。）

1. 中国历史研究法 .41.

2. 梁启超.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第一章. 史的目的. 中华书局, 2010年1版, 2015年5印: 6-7.

序二 从中国为什么贫穷落后到中国为什么能迅速 复兴:宏大问题的背景转换

李子暘

作者杜车别已经出版的两本书《明·冤——毛文龙、袁崇焕与明末中国的历史走向》《大明王朝是被谁干掉的》，我都仔细阅读过，收获很大。头脑中固有的历史观念，被改变了不少，是非常愉快的阅读体验。现在作者又出版新书《中国历史停滞吗？：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再探讨》，我又有机会享受那种愉快的阅读体验了。

今天，我们关注和研究中国历史，是在一个宏大问题的背景下，这个宏大问题是：中国为什么能如此迅速和成功地复兴？意味深长的是，此前，人们关注和研究中国历史，同样也是在一个宏大问题的背景下，那个宏大问题是：近代以来的中国为什么如此贫穷落后？

近代以来的中国，积贫积弱，处处不如人，甚至有亡国之忧。仁人志士一方面奋勇抗争，同时也在知识上展开了深刻反思。这种反思很快就指向了漫长的中国历史。并且，救亡图存的急切心理之下，这种反思实际上已经预设了结论，那就是中国历史应该为近代以来中国的贫穷落后负责。人们要做的就是去历史中去发现和揭示那些导致中国贫穷落后的深层原因。

一个大国几千年的历史，其中内容当然厚重丰富。带着预设结论去找，想找什么都找得到。果然，人们在中国历史中发现了一大堆负面因素：封闭、专制、愚昧、政治高度腐败、经济残酷剥削、个体饱受禁锢，等等。后来，这种反思似乎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全面。中国近代以来落后的历史原因，时间上被

追溯得越来越久远,范围上被拓展得越来越广泛,举凡人种、文化、习俗、饮食方方面面,似乎都是中国落后的原因,同时,也是落后的表现。甚至,统一辽阔的国土、源远流长的耕作传统、蜿蜒千里的长城,这些堪称伟大的成就都被解释为中国落后的原因和表现。据说,大一统的国家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农耕传统造成愚昧落后的小农意识;长城则是封闭社会的典型产物和象征。

自己国家的悠久历史被说成是一部失败史、错误史,这当然让很多人郁闷甚至愤怒,但面对中国各方面都落后的现实,试图为中国历史辩解的人,也确实底气不足。时间长了,很多人甚至已经习惯于贬低中国的历史,悠久的历史仿佛成了中国发展的沉重包袱,要尽快摆脱才行。

这种情绪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达到高峰。但是,进入 21 世纪以后,情况渐渐发生了变化。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即使是对中国最友好最乐观的人,也不曾想到中国今日的成就。所有人都低估了中国。以地球之大,几十亿人,可以说没有一个人在当时预测到中国的迅速复兴——就连大致预测到的也寥寥无几。相反,倒是有很多人多年来持之以恒地一次次预言中国必将崩溃。他们根本不相信中国能摆脱贫困落后。

于是,人们一边批判、抨击中国的现实,一边深挖其历史根源,一边等待着中国社会的崩溃。不知不觉中,中国的改革开放走过了四十年。其间虽然不是一帆风顺,但众多人士言之凿凿的必然崩溃终究没有出现。年年难过年年过,年年过得还不错。相比近代以来的多灾多难,这四十年年的发展很符合那句话:繁荣总是静悄悄地到来,灾难降临才会大喊大叫。

繁荣就算是静悄悄到来的,也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但那些多年批判现实、深挖历史、预言崩溃的人,却不免感到茫然和尴尬。为了解释中国的贫穷落后,大家在历史中翻来翻去,大有心得,突然抬头一看,那个贫穷落后的中

国却已大为改观。眼前一片繁荣兴旺，甚至是前所未有、举世无双的超大规模繁荣兴旺——十多亿人的经济体，经济、社会高速增长四十年！这在全人类历史上都找不到先例。那些心得怎么办？怎么自圆其说？

我个人大概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也就是2008、2009年前后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应该算是后知后觉了，但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从此以后，我就改变了观察和分析中国社会的视角。中国国家成功而迅速的复兴，这是巨大的、无法否定事实。对这个事实，应该有个充分的解释。对之无视或者歪曲的，是在自欺欺人。就像以前解释中国的贫穷落后要从历史中找深层原因一样，这次，除了各方面的现实分析，我们的目光也要投向历史，要从中国古代史中为中国的迅速复兴找到深层的原因和解释。中国当代社会的巨大成就，原因绝不可能仅仅在这几十年中。

可以肯定地说，中国悠久的文明史、政治史、社会史，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发展资源、人文资源和国家资源。正是凭借这些资源，中国一次次从历史的挫折乃至灾难中站起来，一次次复兴。其他古文明被毁灭一次就从世间消失，只留下废墟和古迹，中国却能顽强地一次次战胜灾难，延续文明，并且，复兴的速度越来越快，复兴后的水平越来越高。

杜车别等学人在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努力，正发生在这个问题背景的大转换上，从解释中国为什么贫穷落后，转换为解释中国为什么能迅速复兴。这不是对某个朝代、事件、人物的翻案那么简单，这是历史研究范式转换级别的大变化。

杜车别此前出版的两本书《明·冤——毛文龙、袁崇焕与明末中国的历史走向》《大明王朝是被谁干掉的》都是这方面的优秀著作，用丰富的论据和严谨的论证改变了读者心目中明朝的形象。这本《中国历史停滞吗？：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再探讨》在这个研究方向上又跨出了一大步，推翻了人们认为中国

古代长期停滞的成见。我向读者推荐这本书，并且希望读者在阅读的同时，深入思考这个非常重要、非常有意也也非常有趣的问题——中国古代史中包含着哪些因素，让中国文明能一次次实现复兴？

更重要的是，杜车别的这几本著作，虽然已经有了开启心智甚至振聋发聩的作用，但对这个宏大问题来说，仍然是筚路蓝缕的开拓之作。亟需完成的研究工作量之大，绝非几个人甚至这一代人所能完成，需要更多的人投身其中，奉献出自己的智慧和激情。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一代历史学人，正面对着一个正在开启的巨大无比的学术矿藏。当我们从全新的视角、根据全新的范式开始关注和研究中国古代史，即使是过去非常熟悉的历史事实，也能展现出截然不同的形态和意义——令人鼓舞和振奋的形态和意义。

这是一个无比庞大和伟大的学术工程。对于建设这个伟大工程，现在和未来的几代学人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实际上，对这种责任的承担和履行，正是中国绵延不绝的历史传统之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希望杜车别今后能写出更多更好的著作，也希望能有更多的学人加入这个伟大学术工程的建设中来。我相信，坚持不懈的努力研究，必将让中国悠久的历史焕发出前所未见的热烈光芒。

2018年1月19日

（李子旸 罗辑思维撰稿人之一，出版有《市场的力量》《经济学思维》等。）